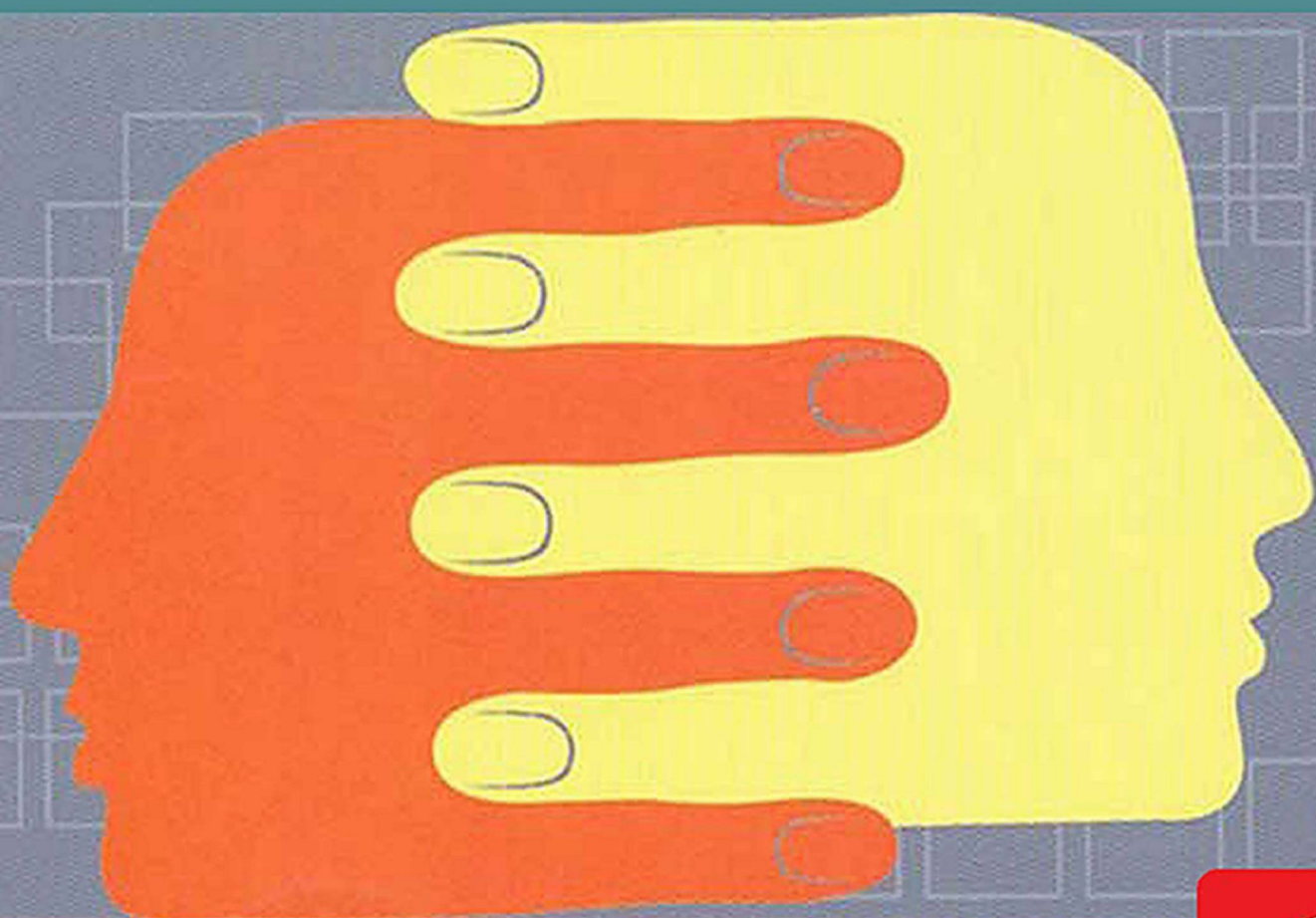


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

李勇先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邹 艳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 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论文集 / 李勇先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14-9211-6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历史地理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185 号

书名 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
——2014 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李勇先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211-6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35.75
字 数 86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2014年9月19~22日,以“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为主题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各位领导和学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下在成都顺利召开。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日本和歌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西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盛会。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50余篇,100余万字,内容十分丰富,且突出了“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及“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有助于提升学术研究,加强学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全国乃至海外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14年无疑是个重要年份。80年前,顾颉刚先生等发起、创办了“禹贡学会(筹备)”和《禹贡》半月刊,被公认为我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标志。35年前,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先生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我国历史地理学者从此有了自己的学会组织。所以,“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研讨会”的纪念意义特别突出。就在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年,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顾颉刚先生诞辰120周年,而历史地理学大师侯仁之先生也在这一年魂归道山,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地学会”之成立(1909年)、“历史地理学”学科名称之提出(1923年)等更不必论。故在年会申办之时,专委会主任吴松弟教授特别强调年会的主题之一应是“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主题是“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近些年来,我国西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颇不平静,以“疆独”“藏独”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不时挑起事端,屡屡制造不和谐声音,而且经常打“历史牌”,以混淆视听。有鉴于此,加强对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安全、发展和历代治理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此形势下,2012年底,由四川大学牵头,联合云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等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就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在得知历史地理学会年会在成都召开

后, 决定全力支持我们办好本次年会。

本次研讨会在我国西南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召开, 因此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也自然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作为对西部边疆治理具有资治作用的西南历史地理问题, 涉及面广且复杂, 故在会议中专门分组研讨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组则就《华阳国志》与巴蜀史地进行探讨。西南地区现存最早的史地典籍《华阳国志》同时也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方志, 被誉为“方志之祖”和“方志之王”, 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如此, 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作编纂了《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集》, 崇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特别影印了清嘉庆十九年题襟馆刻《华阳国志》线装本, 提供给与会专家、学者参考。

至于历史地理专题研究, 历来是各届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题研究其实也最能凸显“创新”这一大会主题。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 从气候水文到灾疫地理, 从经济地理到人口地理, 从行政区划到战略战争, 从环境变迁到城市空间, 从交通线路到社会情势, 从文化习俗到区域特征, 从历史文献到地图绘制等, 均有所涉猎, 充分显示出历史地理学科的交叉性与综合性。

总体看来, 本次研讨会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规模空前。大会开幕时 200 余人的主会场座无虚席, 表明历史地理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二是议题丰富。既有大会拟定的主题, 也有与会者的自选题目, 这样既保证了会议有的放矢, 又充分展现了历史地理学的“生态多样性”。

三是合作融洽。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两个单位承办, 巴蜀书社、成都图书馆、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崇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以上单位为会议提供了资金、资料、人员等支持, 充分保障了会议的成功举行。

四是相得益彰。参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和现场所做的报告, 涵盖了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 同时有约一半内容集中在西部边疆和巴蜀史地研究领域, 这既体现出史地研究的学术求真性, 也表明历史地理学并非虚无之学。

五是研究队伍结构合理。与会代表既有年逾花甲的学界前辈, 也有中生代主力军, 还有新生代生力军。在“继承与创新”的大主题下, 形成了老、中、青合理有序的学术研究梯队, 无疑是历史地理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

会议所提交的论文, 皆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新精神, 而这种创新又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从提交的论文来看, 可以概括出三个“新”特色: 首先是研究方法新, 在一些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 比如政区地理的研究中, 引入了许多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 其次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科领域研究的交叉性, 跨领域、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许多论文中都得到交叉运用; 第三是研究技术手段新, 比如研究中 GIS 技术的利用, 成为图像史学这一新领域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各种原因, 本论文集所收论文, 仅仅是 2014 年全国年会与会学者们大作中的一部分。而且与会议期间所编会议论文集大体按照分组排序不同, 本次

公开出版的论文集基本上是以论文所涉及的时代为序，从古至今进行编排。对于论文集编纂过程中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们谨致以诚恳的歉意，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本次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再到论文结集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与帮助。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对四川大学的信任；感谢出席本次大会与惠赐文稿的各位代表，让本次会议真正成为一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盛会。同时，还要感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社会科学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倾力支持；感谢协办单位成都图书馆、巴蜀书社、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崇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的鼎力相助；感谢为论文集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四川大学出版社文史与古籍整理编辑室主任庄剑博士和各位编辑！

编 者

2015年9月29日

目 录

从《水经注》水系框架复原重构探讨早期中国西部开发治理	张步天 (1)
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	方 铁 (12)
佛教历史文化地理学刍议	杨发鹏 (24)
闽蜀同风源自楚地考	周运中 (32)
纳西象形文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杨林军 (39)
《东西洋考》所见的“番禺”地名释文商榷	
——兼说明清时期以“番禺”代指广州之情况	吴宏岐 (44)
西安附近秦汉以来渭河变迁研究概述	刘 瑞 (60)
秦汉至明清时期西南地区交通发展与沿线城市商业贸易	许桂灵 许桂香 (78)
周孝王所封非子之“秦”邑地望析异	徐少华 (90)
《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句解	谢 乾 (97)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句读解	陈 晨 (109)
僧传所见两晋南北朝巴蜀僧尼地理的若干问题	袁延胜 安子昂 (117)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疆域变动与侨州郡县设置	胡阿祥 (126)
隋唐两代北部防务的变化及其背景	李宗俊 (141)
唐代雅属羁縻地区交通路线新考	郭声波 周 航 (152)
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	罗 凯 (164)
论史念海先生对藩镇研究的学术贡献	
——兼论“藩镇时代”研究的历史地理视角	胡耀飞 (174)
试论《蛮书》的空间论述方式	张 俊 (191)
宋代广西军事地理研究	郑维宽 (211)
宋代成都公署园林西园考	张 蕾 (223)
南宋川陕防区山寨及其发展的连续性特征探讨	伍 磊 (235)
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	翟 禹 (244)
元初赛典赤在云南的水利建设和历史影响研究	黄权生 罗美洁 (256)
元代四川行省设置路府城市录事司探讨	韩光辉 王洪波 (272)
略论明朝政府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治理策略	范玉春 (278)
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	罗 勇 (290)
明清广州府土地利用驱动力研究	王 荣 吴宏岐 (301)

清代中期归化城西北长距离大宗中转贸易枢纽地位的形成原因	牛淑贞 (311)
清代昆明“六河”水系的认知过程与水利设施的地理分布	马 琦 (322)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齐兰古城考述	孙长龙 贾 东 (336)
乾隆时期藏传佛教政策探讨	高 宇 (346)
《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成都府图》中的华阳县研究	李闻杰 (349)
1776至1953年陕甘区域人口变动分析	路伟东 (354)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	段金生 (366)
清末《新疆全省舆地图》的绘制者及版本谱系	刘传飞 (385)
试论钟登甲《蜀景汇览》《蜀景汇考》在四川景观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价值	李勇先 (397)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域整理 (1927—1937) ——以浙江省为例	徐建平 (421)
民国时期新疆地区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变迁	王永飞 (447)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及其历史地理研究	成 佳 (456)
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史地学派”初论	范今朝 (471)
中国对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郭 锐 杨端程 (489)
关于插花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 斌 (497)
论蜀道的文化价值	王小红 (502)
略论侯仁之先生对历史地理学之学术贡献 ——兼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传统的传承创新	朱士光 (513)
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成就和贡献	司徒尚纪 (524)
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变革 ——史念海先生的主要思想与实践	刘景纯 (532)
史念海、陈桥驿、陈朝爵《禹贡》学成就初论	杨 敏 (543)
嘉陵江中游传统聚落旅游资源与文化失忆探析	熊 梅 (554)

从《水经注》水系框架复原重构探讨 早期中国西部开发治理

湖南城市学院 张步天

西部开发是国家战略目标,探讨历史时期西部开发进程及其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水经注》是以河川为纲目的地理书,所记两千多条河流的信息及其构筑的水系框架都涉及了西部地区早期开发治理,本文有关论述依托此书展开。

一、《水经注》水系框架复原重构

1.《水经注》水系框架的含义

水系是指海洋、河流、湖泊等构成的水网系统,多依照江河、湖泊的支流和源流逐级形成的网状结构划分。简而言之,水系是流域内具有同一归宿的水体所构成的水网系统。组成水系的水体有河流、湖泊、水库、沼泽等。河流是水系的主体,由河流组成的单一网络系统又称河系。水系包含的范围较河系广,但习惯上这两种概念经常通用。^①

河流在地表上的分布不是杂乱无章的,由河流组成的水系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任何一条比较大的水系都是由许多层次的小系统组成的。可以形象地说,处于水网末端的若干条河流注入较大支流组成次级系统,较大支流接纳众水汇入更大支流组成高一级系统。如此叠加,汇集入海(湖)形成独立系统。这种多层组合而成的“河流群”就是水系。

河流是组成水系的单元,探讨组合“河流群”的依据即科学法则,应该从河流的关键——流动水体,进行论证。河流都有源头和归宿及其形成的“流动水体”轨迹。即每条河流都有河源和河口。

河流源头和归宿及其形成的“流动水体”轨迹,是构筑《水经注》水系框架划定水系的切入口。划定某一河流的水系归属,应按其径流归宿认定,即流入某河归属某河。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已经构筑了水系框架,今本40卷就体现了这种框架的存在,也是后人复原重构的依据。

《水经注》各河有源头和注处的明确记载,有入、出,枝津、枝分、枝流、首受、上承等术语,在复原重构《水经注》水系框架中,要充分应用这些术语。“入”即流入,指某河注入,亦即此“入”之河为支流。“出”即流出、分出,指某河分流,此“出”之河为“枝津”“枝分”“枝流”。在介绍这些“枝津”“枝分”“枝流”时,分出的河口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称“分口”，注入的河口称“注口”。

《水经注》记载的该时代河流可以按照上述科学法则分为几大水系（群），组成的大系统就是“《水经注》水系框架”。

本框架编制力图表达《水经注》所载以河流为纲目的陆地各种水体的水系特征和水文特征，以河流水系归属为表达形式，以河流的节点作为最基本单元。河流节点可以是源头（只采用由另外一条河流枝分的分口），接纳支流的注口，该河流的归宿（注口或入海口）和其他节点。因为每一条河流都有其归宿，故而肯定有一个节点。统计本框架共 2705 个节点，多于河流数的节点主要是河流枝分的分口，河流经过的连接湖（位于河流一侧）和连通湖（河流从该湖通过），其他可用地图和文字框架表示的表现水文特征的河流自然地理要素，如伏流，瀑布，滩濑，温泉，以及少数特殊节点。

复原重构的《水经注》水系框架，共分河水水系、河水以北诸水水系、济水及附近诸水水系、淮水水系、江沔水系、江水以南诸水水系六大板块。

构建《水经注》水系框架须先建立《水经注》系列，上述以河流为基础的“节点”都拥有互不相同的序列号，而且按照共同的特定关系处于《水经注》大系统之中。每一节点有专属代号。代号由阿拉伯数字组成，各数字间用圆点隔开，第一节数字仅一位数，河水水系为 1，河水以北诸水水系为 2，济水及附近诸水水系为 3，淮水水系为 4，江沔水系为 5，江水以南诸水水系为 6。第二节或以下各节数字可能有多位数，河水水系、淮水水系、江沔水系为其一级支流；序次按上游至下游；以下二级支流、三级支流等也按上游至下游序次。河水以北诸水水系、济水及附近诸水水系、江水以南诸水水系，各河干道即入海（内陆河则是入湖）干流用第二节数字表示，以下类推。构筑《水经注》系列，促进河流地名系列化，有助于《水经注》水系研究的深化。

本框架则将《水经注》系列构筑于一个总系统之中，由河流源头至下游河口顺序排列。凡河流源头另有专称或上承关系等因素者数字用 0。各河流名有方括号者为枝分，表示在该项位置上不属于支流关系。圆括号者为湖泊或特殊节点。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水经注》框架系列将不断完善。^①

2. 《水经注》水系框架展示的中国西南部开发的波状递进特征

《水经注》水系框架涉及中国西南地区的有：江水水系的江水上源段（实为今长江支流岷江段），江水支流若水（实为今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符黑水（今南广河），绵水（今沱江），犛部水（今赤水河），西汉水/潜水（今嘉陵江），及其下各级支流流域；江水以南诸水水系的郁水（今珠江主干西江），僕水（今元江），兰仓水（今澜沧江）及其下各级支流流域。限于篇幅，本文只列框架表一部分。

《水经注》水系框架展示的中国西南部开发的波状递进特征有以下要点。

先民探索河流源头有一个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与该地域的开发进程呈正相关。长江是中国境内最长河流，江源探索历时久远，《水经注》以岷为江源是先民江源认知过程节点，先民以岷江为江水之源，反映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地早期开发在西南广大地域处于超前发展的事实。“江水上源段”又可称作“岷源江水”，指江水及其分出的沱江，

^① 参见张步天《水经注地图集·水系图集并附文论三种》，2013 年 12 月内刊本。

止于今四川省宜宾市。酈注沱江指开明所凿沱江—湔水—洛水（今沱江）—中水，止于今四川省泸州市。上述河道又可视为自源头而下，中途分流，然后二河合流。即：岷江加宜宾至泸州之江道，与上述酈注沱江之合流。

《水经注》有关若水口以上诸水的记述显示长江上游开发的波状递进特征，即从中原向“四裔”递进。《水经注》将今雅砻江与注入金沙江后至岷江口之间水道称若水，而将今金沙江接纳雅砻江之前水道称淹水（绳水），且将其作若水支流，反映了当时的江水认知状况。酈氏以今岷江为江水正源，又以若水为江水西侧一级支流，金沙江作若水支流，符合古代对四裔的认识从中原向周边扩展的规律。

《水经注》有关兰仓水记述显示边地开发的波状递进特征，即从开发较早的大河中段向上游、下游两端递进。兰仓水即今澜沧江。据郑德坤氏存图，兰仓水北纬 24 度至北纬 28 度附近以内为正色。表示这一河段附近地区已进入《水经注》信息库。即该地域已进入中原史册，开发程度较高。酈注兰仓水无专条，仅见卷三十六《经》“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下《注》云“按永昌郡有兰仓水，出西南博南县，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县以氏之”。博南县即今云南省永平县。兰仓水在《水经注》中未显示源头与注处，作独立水系处理。

《水经注》水系框架表江沔水系一部分

5 江沔水系
0 江水源：涑水
1 汶水
2 湔水
3 [沱水]
4 [灌江] 4.1 羊摩江 4.2 文井水 4.2.1 布僕水
5 [望川原凿山度水结诸陂]
6 [郫江]
7 [五城水]
8 郫江水
9 沫水/青衣水 9.1 青衣江 9.2 邛水 9.3 泯水

续表

5 江沔水系
10 若水 10.1 鲜水 10.2 孙水 10.2.1 温水 10.2.1.0 (温泉) 10.2.2 邛河 10.2.2.0 (邛池) 10.3 淹水 10.3.1 临池泽 10.3.2 晴岭水 10.4 卷 37《经》淹水 10.5 母血水 10.6 骏马河 10.7 涂水 10.8 卑水 10.9 马湖江
11 符黑水 11.1 大涉水
5 江沔水系
12 绵水口：沱江 12.0 绵水 12.1 洛水 12.2 湔水 12.2.0 源 (承江水) 12.2.1 沱水 12.2.2 [湔澳] 12.2.3 郫江 12.3 五城水

二、先秦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西部开发治理

1.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益州地区的开发治理

中国西部许多地区曾经是发展程度很高的地方，古益州地区就是典型的代表。“天府之国”的经济发达条件，加上北倚黄河中下游中原关中早期政治中心，东邻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缘优势，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本地区一直处于发展前列，且具明显的连续性。大统一时，巴蜀是堪与早期的燕赵齐鲁，后期的苏浙闽广比美的西南明珠，曾称“扬一益二”。历史时期分裂时段，成都或是鼎立朝廷帝都，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次年（221），刘备以汉宗室身份在此称帝，延续汉朝大统，历二帝共四十三年；或是割据政权都城。战乱之秋，四川往往又是国家中枢退守复兴之地：古时唐玄宗、僖宗两度入蜀，成都号称“南京”，现代抗日战争国府迁渝，重庆定位“陪都”。

(1) 开明开凿岷江分洪

古蜀国开发甚早。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先王蚕丛为黄帝娶蜀山氏女子所生。

《华阳国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蜀地洪水。治水是古先民生存环境开发的重要内容，许多古代贤哲之所以彪炳史册，其功绩主要是治理洪水。岷江是长江流域水量最大的支流，成都地处岷江由通过山岳区大流量向平原区水流缓慢的接合地带，容易暴发洪水灾害，历史早期更是如此。《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县即汶山郡治，刘备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桥。”

这段注文可作如下解释：江水（今岷江）流至今汶川县时，水势放缓，以鳖灵为代表的治水决策人员，根据当地的水文、地形情况，选定在玉垒山上游，开凿泄洪水道连接湔水。此水道名“沱”，即沱水。其时今之沱江称洛水。《水经注》所记开明开凿岷江分洪见以下考证。

（2）李冰主修都安堰水利工程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云：“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崩。崩有左右口，谓之湔崩，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踰金堤者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郾氏这一段注文将都江堰的地理位置（都安县。今都江堰市），工程结构（壅江作崩。崩有左右口，谓之湔崩），施工（因山颓水，坐致竹木），制作调控设置（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排洪与航运兼顾（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又穿羊摩江、灌江），工程综合效益（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官方管理机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等等全部提及，可谓面面俱到。而且又引“水旱从人”等语，堪称绝妙。“从人”者，人可主控自身所处生存环境之谓也。

都江堰是建于古代且使用至今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定为世界文化遗产。1500多年前的地理巨著《水经注》全面记载了这一项蜀地开发成果，也可称作一绝。

（3）开明凿沱与李冰都安堰对成都平原河道径流分布的影响及其考证

开明凿沱与李冰都安堰的治水策略在于岷江分洪，即以成都平原河道径流均衡分布为目的。岷、沱二江夹辅成都，岷江分洪实质乃是岷水入沱。现代沱江发源于九顶山，该山在茂县境内，主峰海拔4984米。沱江三源。东源绵远河长180公里，中源石亭江长141公里，西源湔江长139公里，三源汇于金堂县赵镇附近。沱江上游各级支流临近岷江流域者，几乎都与之共源。而且，成都平原岷、沱水网交错，沱江径流夹有岷江之水。虽则流域错乱，但却造就郾注所引“《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且造福至今。现代成都平原岷、沱水系布局，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明凿沱与李冰都安堰水利工程的开发效果。

李冰都安堰堪称世界之最，史载确信，且有遗迹历历在目。然而，即使开明治水一事也存争议。20世纪80年代，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①认为“鳖灵决玉山的传说，是在开明氏进入川西坝约一千年后的东汉末期或蜀汉时，通过三步较大的演变而最后改定形成的：第一步不涉及治水，第二步凿巫峡，第三步才是决玉山”。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论著也很多。如李绍先^②还指出其地望在今都江堰市南聚源镇西，但此古江沱入水口早已废弃^③。

本文仅就郾注“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考其地望。杨守敬《水经注》图绘在今汶川、茂县之间。笔者《水经注地图集》初稿亦从之。查现代地图，今四川省汶川县北雁门乡注入岷江之花果园河与郾注“下注江”之湔江（注口在今都江堰市紫坪铺镇）两河上源相距甚近，今花果园河或是郾注沱水遗存。开明凿沱意在通湔，既疏通江水（今岷江）主泓，避开径流高峰，达到防洪目的，又引水灌溉，与以后的李冰治水方略别无二致。

然而，上述推断与《水经注》记述河流顺序不符。郾注记水大多严格按从源头向注口排列。《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文开头引《山海经·海内东经》（实为西汉《水经》佚文）所列水名，就与主河道沿途接纳支流的顺序不合。虽或可解释为“概述”“引言”，但以下注文“江水又东别为沱”在“又有湔水入焉”之后，就有可推敲之处。其一，若以沱水分口地望在今汶川、茂县之间，则此处郾注顺序不合。其二，若郾注顺序无误，则上述沱水分口地望考证不确，应另辟蹊径。其三，若郾注顺序无误，“江水又东别为沱”之后紧接“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则开明凿沱与李冰作大堰相距甚近。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拟改旧稿，将开明凿沱处考定在江水接纳湔水至李冰作大堰之间，沱水故道在今都江堰市紫坪铺镇与蒲阳镇境内。地图用虚线，表示故水道，与注入绵水的湔水连接。既符合郾注顺序，又解决了开明凿沱存疑问题。考开明时代正值中原东周前期，下距都江堰建成的公元前256年并不太久，李冰父子规划都江堰工程时肯定在附近地段作了详尽的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虽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循开明故迹构筑工程，但并无改变的水文地势自然规律将前后哲人的治水方略推向一处。

开明、李冰前后哲人蜀地治水活动的承传关系，可能成为都江堰研究重要领域，我们希望在考古、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进展。

（4）成都营建开发

成都是我国城市中唯一的建制后城市名称和城址未变异的范例。《水经注》有成都建制之始的营建开发记录。卷三十三云：

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导江也。仪筑成都以象咸阳……初、张仪筑城，取土处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顷池是也。城北有龙堤池，城东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

① 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② 李绍先《鳖灵蜀中治水研究》，《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③ 魏达议《成都平原古代人工河流辩解》，《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竭。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下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后州夺郡学，移夷星桥南岸道东。道西城，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蜀有回复水，江神尝溺杀人，文翁为守，祠之，劝酒不尽，拔剑击之，遂不为害。

这一段注文记述的成都营建开发过程颇详，着重“城”“池”、水上诸“桥”、基础官学及地方特产，反映中国古代重视城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传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蜀锦名扬天下，所记“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又道出了不同水质的差异，诚为可贵。以筑城时取土夯垣留存之处为池，且“因以养鱼”，有利民生，又将诸池连接，使城区“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巧妙解决城市供水，规划周密。注中述文翁剑杀江神之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对城市水害的重视与治水功绩。

公元前 311 年，张仪筑建成都，是有文献记载的成都建城之始，其时又修郫城、临邛二城。其实，广义的成都城营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的宝墩文化遗址，经考古挖掘发现一座距今 4500 年的古城。城址呈不规则圆角长方形，长约 2000 米，宽约 1500 米，周长近 6200 米，面积达 276 万平方米。连同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下芒城）、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共 8 个史前城址。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南兴镇，近邻成都市新都区。城址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经测量东城墙长 1100 米，南墙 180 米，西墙 600 米，为人工夯筑而成。城址内发现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多处。祭祀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立人像连座高 262 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成都附近出土的反映古蜀人体质特征的共同点“大眼球”与古籍所载“纵目”十分相合。

上述古城遗址分布在张仪筑城城址不远，它们在地图上的连接线就是古蜀国先民自岷江上游迁至成都平原后寻觅合适都城探索过程的轨迹。

《水经注》又记述成都近郊地区的开发。云：“江水东迳广都县，汉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崖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江北则左对繁田，文翁又穿湔渎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顷。江水又东绝绵洛，迳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斯为北江。”

广都县地望即今成都市双流县华阳镇古城村。当地史志称古蜀王蚕丛、杜宇、开明氏等曾先后以广都瞿上、樊乡为治所。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次二年，封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双流地属蜀郡。广都为西汉置县。这一段注文主要

记述成都近郊开发。望川原故地当在今成都市区与双流县之间的江安河一带。“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顷”则在成都市区之北的新都、彭州之间。五城水口位于广都县北，为五城水注入江水处。其时江水（今岷江）主泓流过此处，今水道已大变。五城水为涪水枝分，涪水属西汉水水系，穿过绵水注入江水。五城水也是古成都重要地名。

2. 古宁州地区的开发治理

作为一级大行政区的宁州始置于西晋泰始六年（270）八月，治味县（今云南省曲靖县十五里三岔一带）。味县同为建宁郡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宁州标在今云南省昆明市南，东晋宁州治所在同乐县（今云南省陆良县东），其时建宁郡治已由味县迁此。太康三年（282），废入益州，立南夷校尉护之。永宁二年（302），复置宁州。咸和八年（333），没于李雄。咸康五年（339），复入于晋。直至南北朝后期北周时期，因西魏已设置宁州于彭元（今甘肃省境内），为区别南中宁州，则将彭元的宁州改称为北宁州，南中宁州改称为南宁州。唐初南诏吞并南宁州，南宁州废。

今云南地区属于西南边疆省份，古宁州辖区覆盖今云南省。云南是人类文明最早开发地区之一，元谋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先民。战国后期秦、楚大国经略云南，中原文化进入。即使处于西南边陲地带的澜沧江、怒江地区，中原文化早在西汉时代即已传入，云南地区在历史时期早期已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区体系。《水经注》有关记述印证了这一地区的开发治理进程。

（1）夜郎地区开发

《水经注》卷三十六《经》“东北入于郁”下《注》云：“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白：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柯，斩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华阳国志》与《后汉书》都记载了上述有关古夜郎国的起始故事，郦注当引自其书。

古夜郎国是西南史地研究中重要课题，有关古夜郎国起始的论证非常活跃，从考古、少数民族史籍、汉文史籍挖掘信息，取得许多研究成果。阿侯布岱^①根据彝文抄本《夜郎史传》探讨古夜郎国发源。该书凡3卷，彝文抄本。成书不晚于清代。详细记载了彝族先民中夜郎族家支，涉及疆域、谱系、地域、城池、法律、经济、军事、政治、联盟、战争等方面。阿侯布岱认为，古夜郎国族源乃古夷人武都族武彘一支，始祖彘阿蒙。3世孙夜朗朵建国，称“夜郎勾起”，时约春秋中叶，地在滇东北。彘阿蒙8世孙武阿古时，居太液南岸，“太液”疑是豚水。彘阿蒙27世孙莫邪费为末代王。

郦注又云：“豚水东北流，迳谈藁县，东迳牂柯郡且兰县，谓之牂柯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一名头兰，牂柯郡治也。楚将庄蹻溯沅伐夜郎，楛牂柯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矣。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关。牂柯亦江中两

^① 阿侯布岱《古夜郎国的文化源头考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山名也。左思《吴都赋》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发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会番禺是也。”

按阿侯布岱考证，“太液”当是郦注“夜郎豚水”，夔阿蒙 27 世孙莫邪费则或是说出惊人妙语“夜郎自大”的夜郎侯了。末代夜郎侯（王）还配合武帝伐南越，发精兵下牂柯江同会番禺，与中央王朝关系更为紧密。古宁州有夜郎郡，治所在今贵州省普安、关岭二县之间^①，距宁州治所味县（今云南省曲靖）不远。古夜郎国地域地跨今滇东北、黔西南，开发较早。汉武帝开发夜郎之前应该还有更早一波中原文化开发，即下述郦注“楚将庄蹻溯沅伐夜郎”。

（2）滇池地区开发

《水经注》有关记载反映了今云南省会昆明市附近地区的开发治理进程。卷三十六《经》“温水出牂柯夜郎县”下《注》云：“县，故夜郎侯国也，唐蒙开以为县，王莽名曰同亭矣。温水自县西北流，迳谈藁县，与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铜濬县谈虏山，东迳谈藁县，右注温水。温水又西迳昆泽县南（张案：此九字似应下移‘味县’句之后，不然先后顺序与地望不符）。又迳味县，县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张案：‘温水又西迳昆泽县南’九字似应下移此），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温水又西南迳滇池城，池在县西北，周三百许里，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言：晋宁郡滇池县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有滇州（张案：滇州或是宁州另一名称，意指滇地之大行政区‘州’），元封二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刘禅建宁郡也（张案：当理解为汉代所立益州郡，刘禅分置建宁郡于此）。温水又西会大泽，与叶榆仆水合。温水又东南，迳牂柯之毋单县。建兴中，刘禅割属建宁郡。桥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县治龙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与邪龙分浦，后立河阳郡，治河阳县，县在河源洲上，又有云平县，并在洲中。桥水东流至毋单县，注于温。”

温水即今南盘江，为珠江正源，发源于曲靖市沾益县马雄山东麓，流经云南省曲靖、陆良、宜良、华宁、弥勒、开远、泸西、罗平、师宗等县，汇入黄泥河后出省境为贵州、广西的界河，经珠江三角江，于广州附近的磨刀门注入南海。

据考古研究推断，古滇国约公元前 5 世纪即已形成，其时，今滇池地区经济社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其依据主要是石寨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古滇文化的重点分布区在滇池东南岸的晋城、上蒜及其周边地区。

史载中原文化传入云南始见于楚人庄蹻入滇事迹。《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一记载成了古滇地最早接触中原文化的“楚人说”。不过，楚人庄蹻入滇在古代就受到质疑，《水经注》

^①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北朝宁州图。

未引此记,唐人李泰《括地志》、梁载言《干(十)道志》(或称为《十道四蕃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虽都记载有滇国,却都只字不提庄蹻。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庄蹻入滇仍有正反论述,张增祺从考古的角度论证,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能支持庄蹻入滇的说法^①。王海平则据考古资料分析提出反证,认为庄蹻入滇时间在楚顷襄王时的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77年间,路线为溯沅水而上,经且兰、夜郎入滇。^②

有关古滇文化的论点主要有:百越说,流传最广;濮人说;氐人说;多元说,春秋中期被“楚庄王威服后南迁”的濮人和战国中期因“畏秦之威”南迁的氐人在滇池区域融合当地土著文化的产物,既非楚文化,也非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更非土著文化,而是诸多文化相交后的变异。

笔者认为,有无庄蹻具体事例不会影响战国时期楚、秦文化入滇的可能性,楚文化入滇当循《鄂君启节》所记溯沅水而至。汉武帝滇王内附,今云南境内广设郡县则是第二波中原文化入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武帝赐予滇国王的金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后蜀汉诸葛亮经略南中,调整并增设郡县,不久后晋代又置宁州,提升行政区划级别。这些都是滇地开发治理进程重要节点,《水经注》对此均有叙及。

(3) 兰仓水地区开发

《水经注》卷三十七《经》“过不韦县”下《注》云:“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有牢山,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孕,产十子。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九子惊走。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为九隆。及长,诸兄遂相共推九隆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生十女,九隆皆以为妻,遂因孳育,皆画身像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与中国通。汉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箬船南下,攻汉鹿蓼民。鹿蓼民弱小,将为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风漂起,水为逆流,波涌二百余里,箬船沈没,溺死数千人。后数年,复遣六王,将万许人攻鹿蓼。鹿蓼王与战,杀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见骸骨,惊怖引去。乃惧,谓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微,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蓼,辄被天诛。中国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诣越隼奉献。求乞内附,长保塞徼。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置为永昌郡。郡治不韦县,盖秦始皇徙吕不韦子孙于此,故以不韦名县。”

上述注文概述哀牢国始祖九隆传说及其地内附设置郡县的开发治理进程。这一进程得到考古资料支撑。兰坪玉水坪遗址位于今云南省兰坪县通甸镇,前临澜沧江支流玉水河,为岩洞—岩厦型遗址。洞内遗址的上层堆积为新石器文化层,下层堆积为旧石器文化层,先后采集和征集到磨制石器、陶片、骨饰、动物骨骼等。耿马石佛洞遗址位于耿马县四排山乡勐省村,地处澜沧江支流小黑江边的悬崖上,是一处大型的天然石灰岩洞穴。洞穴内有建房和墓葬,为国内仅有、世界罕见。

九隆传说早见于《风俗通》和《华阳国志》,颇具神话色彩,郦注当引自此。今云南省保山地区还保存许多与之有关的文化遗迹,如保山市城名“隆阳区”;蒲缥、瓦窑

① 张增祺《从滇文化的发掘看庄蹻王滇的真伪》,《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王海平《庄蹻入滇略探》,《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